

异质文明相容共生：澳门风物志

◎吴宏岐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澳门研究尤其是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关于建立“澳门学”(Macaoology)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学者相继从理论层面针对“澳门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何从方法论的高度深入探讨相关问题以推动澳门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史地不分家
是历史研究的一贯传统**

应该承认，前贤对澳门学尤其是澳门历史学研究理论方面的相关探讨，富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毋庸讳言，这些理论层面的探讨多少也存在忽视历史地理学方法的倾向。造成这种偏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乃在于学科间的隔阂，即历史学者通常将现代的“历史地理学”(The Historical Geography)与传统的“史地学”整齐划一。实际上，从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史地学”，过去又称为“舆地学”，基本上可视为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The Evolution of Geography)的同义词，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主要研究历史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素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则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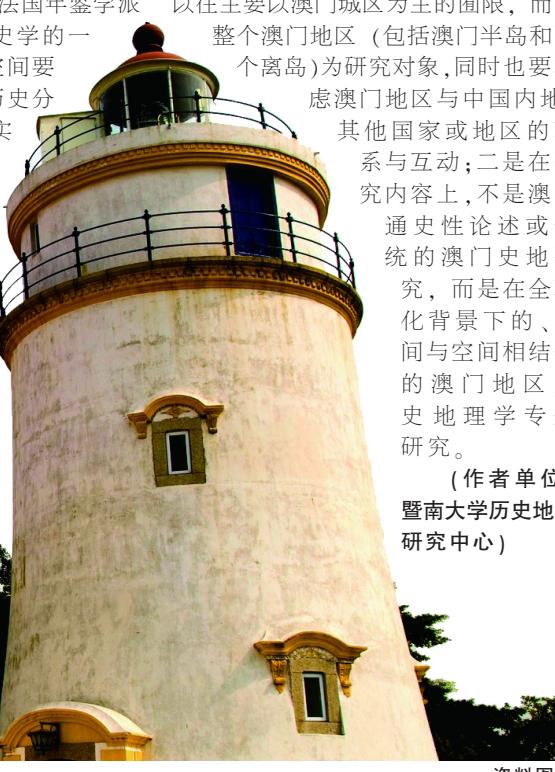
■澳门松山灯塔

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历史城市地理与中国古都学、历史商业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图编制、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历史地理研究等领域均取得较大学术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间学术合作与联系的逐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许多新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不仅引起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且预示着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重视；二是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三是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化。现代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和人地关系，研究视角侧重于“时间和空间之间的探索”，其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其理论与方法，显然值得澳门学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参考和借鉴。

历史发展是一个复杂现象，既有时间上的变化，也有空间上的差异，正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交织，才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地理问题。其实，史地不分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贯传统，而且有些史学家还能够做到以时空结合的视角来探讨相关历史问题，如

异质文明共处澳门一地

从西方历史学思想发展史角度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就开始探讨地理与历史关系，并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近世国外不少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也能注意到从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维度来分析历史问题。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史学的一个特色，正是把时间和空间要素融合在一起。传统的历史分析，着重于时间过程的事实分析叙述，而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像他一样，用一系列学术概念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应用在史料上得出新的历史视角。



■澳门仁慈堂，于1569年由澳门首任主教贾尼路创立，该大楼修于18世纪中叶，至1905年形成今天的面貌，具有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本报记者 武雪彬/摄

文化扎根： 澳门学的比较研究视角

◎普塔克(Roderich Ptak)

从商业、政治、文化等方面将澳门与其他港口城市进行对比，我们或可更加清晰地认识澳门的历史。港口城市有不同类型：商贸中心，即那些有一定潜在市场条件的地区，如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没有或较少制度方面的障碍，货物集散地，即在一个封闭的或是半开放的贸易网络中起结点作用的地区；出口港口，即专门出口某种(或少数几种)由内地制造的商品的城市；以及主要在两个或多个地区文化交流中起媒介作用的文化桥梁型城市。

澳门似乎具有多重元素，有些元素可以归入前文所述进行分类，有些则要另行定义。因而，如果要将澳门与其他港口的历史加以比较，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些差异。有鉴于此，最理想化的情况就是选择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商贸中心、货物集散地或出口港口，又是主要文化中心的地区。

以贸易闻名的热兰遮城 是“精神沙漠”

有一个港口也许很适合作这类比较，那就是热兰遮城，它位于台湾南部，曾被荷兰人短暂统治。该港口以贸易闻名，但在文化交流方面则稍有不及。那么我们能否通过对比热兰遮城与澳门的历史，解释二者不同结局的原因呢？

首先，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半岛是经过协商的，而热兰遮城建立的背景则不同。澳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澳门半岛南部，曾被委托给葡萄牙人管理，以换取其在中国政府对抗海盗时提供一定的军事协助或资金帮助或有其他的原因。长期以来，中葡之间鲜有武力冲突(虽然有一些小的冲突事件，但数量极少)，而荷兰人在占据台湾海峡几十年中则是另一幅图景。1622年，在一次对澳门进攻失利后，荷兰人把目标指向澎湖群岛。后被明朝政府从澎湖群岛驱逐，于是他们决定占领台湾。除了将热兰遮城建成重要军事要塞，野心勃勃的荷兰人还试图扩张对该岛屿其他地区的控制。

第二，将全球史的视野用于澳门研究中的具体个案，均从全球视野作综合考察，这样能够更好地呈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特征，属于近年出现的一个全球史研究分支，即Global Perspective。第三，用全球史理论、方法和视野书写澳门通史。澳门史不应是地方史，也不仅是广州口岸史的一部分，将其纳入到全球互动的网络之中，并在这种网络互动之中呈现澳门历史的真正内涵与价值，凸显澳门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特殊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事支持下的官方行为。

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 共建“文化绿洲”

热兰遮城有毛皮贸易区为后援，而澳门则没有类似的这种贸易网络。然而，澳门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网络为其后援：这就是耶稣会的“精神帝国”。兼传教士、科学家、外交家多职于一身的耶稣会士，即使在明清朝代更迭的艰难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教堂得力的助手。甚至他们中的某些智者还曾警告清政府要小心贪婪的荷兰人。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这里也有一些新教传教士，但是他们在岛上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无法与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的成就相媲美。这就导致另一个问题，即从分类视角看，澳门更多地发挥了其文化桥梁的作用。如果我们考察双方知识精英的交流，就会发现这种差异愈加凸显。当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展开交锋时，类似的对话在台湾却难以听到。澳门是知识精英邂逅和新朋友结交的基地，热兰遮城则不然，它是“精神沙漠”。

耶稣会士渴望在宗教传播上获得成功，澳门商人则致力于其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从教会角度而言，澳门作为其宗教传播的桥头堡，服务于耶稣会，是天主教里斯本宗主教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澳门居民则认为：倘若传教士持谨慎、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将对澳门有利。最终，清政府接受了这样的局面。它深知澳门的葡萄牙人没有野心，因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帝国内容忍这样一个特殊区域的存在也未尝不可。台湾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宗教系统。谁对谁有利这一微妙问题在此地基本无关紧要。此外，在朝廷看来，澳门离帝国近，热兰遮城则处于一个有相对安全距离的位置。尽管清王朝对荷兰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他们也没有过多干涉台湾的事务。这项工作只好留待郑成功解决。但仅20多年后，清廷登上了历史舞台，决心平定台湾。

地理上而言，澳门远离葡属印度中心果阿，然与其东道主——明清朝廷，至少在精神上紧密相连。打个比方说，耶稣会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在外交层面均掌握“得体举止”的艺术。无论中葡双方，还是耶稣会，各方精英文化上的“亲近性”强化了澳门的地位，尤其在其局势严峻时。而热兰遮城，无论与其“宗主国”——爪哇的东印度公司联系多么紧密，也没有一家类似天主教会这样独立的或者说准独立的、全球化“企业”可依靠。台湾荷兰人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可合作、可咨询的坚实伙伴，也没有先导和中间人。这种统治结构(就是说，荷兰人在这块岛屿上的据点)仅仅依靠一根支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这反过来又导致对枪炮的依赖。相形之下，澳门、里斯本、耶稣会和明清两代各级行政机构均充分使用了“适应性策略”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至少在明代与清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出于尊重，双方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的公共话语。

依照以上惯例，澳门日益增强了其在明清朝廷心中的信任度。在这个意义上，澳门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典范，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儒家思想和传统。基于以上角度，某些经济史学家所谓中国容忍葡萄牙人在澳居住不过是出于能为其带来某些物质利益的观点应该被修正，抑或被扬弃。我们不能将澳门这一事例的成因单纯地归咎于经济方面。

(作者单位：德国慕尼黑大学；刘芳/译)

近代早期中西关系研究代名词：“澳门学”之幸

◎董少新

“澳门学”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澳门研究继回归前后的热潮之后，再次成为学界热点。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前次热潮中那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虚假繁荣，有必要对当前的“澳门学”做一些“冷思考”。

研究群体决定学科走向

就研究现状而言，“澳门学”仍在形成过程中，距离自成系统、具有独特的研究范畴、方法、理论的一门独立学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成为一门学科，起码需要三个基本要素：研究对象具有重大意义；具备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一批原始文献和文物，即该研究具有坚实的资料基础；已经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该领域的研究的学术方法、理论起到引领性的规范意义，而且对其他学科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影响力。

澳门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已具备坚实的资料基础，三个主要要素已具其二。之所以说“澳门学”仍在形成过程中，主要是因为它欠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未来能否产出一批考据严密扎实、理论和方法上可以引领一时之学术潮流和风气、获得国际主流学界关注和认可的学术成果，便成为“澳门学”成败之关键。

已有的澳门研究成果，数量极为可观，但整体而言，大量论著选题重复、疏于考证，理论和方法上缺乏创新。这一状况不仅无法为其他学科提供借鉴意义，也无法引起国际主流学界的关注，而且对“澳门学”自身的发展也构成严重伤害。这与敦煌学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敦煌卷子被发现后，迅速引起一大批中外重要学者的关注，他们通过扎实研究，形成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不仅使敦煌研究成为一门学问，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批著名学者的大量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敦煌研究才被学界称为“敦煌学”。而就目前澳门研究的水平而言，“澳门学”还不是现实存在的一门学问，而只是一些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澳门研究领域能否产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者，

关键不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而在于澳门研究学术群体中的每一位学者。

“澳门学”应注重“内外双修”

16世纪以来，欧洲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有了直接贸易和文化交流，规模庞大的中国经济体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通过澳门传入的西方宗教、科技和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中国传统学西传欧洲，对西方的近代化过程也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澳门学”的关注重心是近代早期中国经济进入全球经济网络的历史过程、中西文化双向交流及其深远影响。澳门是“窗口”，是“桥梁”，其研究不能仅仅研究“窗口”或“桥梁”的两端，研究通过这座“桥梁”或这扇“窗户”流入和输出的物质与文化，及其在“窗”内外或“桥”两端所发挥的作用、引起的影响。以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将其置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方文化广泛交流的框架下，着重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澳门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和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即使针对澳门自身的内部研究，如澳门的族群、宗教、艺术等问题，也应在这一背景下予以关注。

确立这样的研究侧重，是否会“架空澳门学”，或者使“澳门学”仅具有象征意味，实则却是传统的中西关系史？是否会使19世纪以后的澳门史，特别是现当代的澳门成为“澳门学”的“飞地”而受到忽视？我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无论是敦煌学还是徽州学，名称均具有象征性，但研究内容绝不限于敦煌或徽州当地，而是将地方与区域、内部与外部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如果“澳门学”将来能够成为近代早期中西关系研究的代名词，则实为“澳门学”之幸。因此，“澳门学”的概念具有一定历史性，就如敦煌学甚少涉及当代敦煌社会发展研究一样，“澳门学”亦不必面面俱到。

“澳门学”研究需注入全球史理论

全球史研究注重宏大视野中的整体性叙述，尤其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



■澳门民政总署大楼内镶嵌在墙壁上的石碑

图片来源：CFP



■主教山小堂又称海崖圣母小堂

资料图片